「今晚我要去跳舞，你們誰來幫我帶小孩？」：評《「沒有公婆的一代」》

李廣均
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教授

《「沒有公婆的一代」：解析 1940/1950 年代來台外省女性的逃難與成家》，張晉芬著，政大出版社，2025 年 10 月，269 頁。

一、前言

戰爭無情地觸發人的移動，其中的原因、過程與影響成為人文歷史與社會科學關心的重要主題，1949 前後來台軍民的生存、生活與生命歷程即為一例。對此，張晉芬老師所著《「沒有公婆的一代」：解析 1940/1950 年代來台外省女性的逃難與成家》提出了一個少見而重要的視角，主要嘗試從女性觀點來省思戰爭經驗。

不同於傳統社會學研究以一個需要驗證的問題意識或命題作為起點的寫作方式，本書以口述歷史與紮根理論作為主要研究方法，引用編排大量訪談資料並與相關文獻進行對話，表現方式更接近歷史與人類學的知識樣貌，累積了戰爭史、女性史、戰後台灣史的智性厚度。

本書提醒讀者跳脫男性主導的歷史觀點，翻轉我們對於戰爭的認識，除了提出女性觀點之外，也強調平民（相對於軍人）視角，讓我們得以重新思考不同性別和階層對於戰爭的「貢獻」，檢視戰爭帶來的「傷害」，進而再次界定戰爭之下的「前方」和「後方」。

就人類知識的發展趨勢來看，女性主義已經出現一段時日，但是從女性觀點來省思戰爭的嘗試卻可能才剛起步，還有許多議題和現象

《台灣社會學》第 51 期（2026 年 6 月），頁 127-134

尚待探索。本書提出「沒有公婆的一代」此一核心概念，主要指涉那些在 1940/50 年代因為中日戰爭、國共內戰而必須不斷遷移、逃難和成家的來台女性，透過深度訪談和口述歷史，作者帶領我們再次踏上受訪者的移動路徑，得以反思過去那些由男性主導的歷史知識和戰爭認知的侷限性。

對於了解 1949 戰後來台軍民的移動經驗而言，《「沒有公婆的一代」》一書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和珍貴的田野資料，幫助我們由下而上地以女性和平民的角度來認識戰爭、移民和歷史，填補了下列圖表之中第四象限的知識缺口。

性別 階層	男	女
菁英	I	II
平民	III	IV

二、本書的核心概念

如書名所示，本書最重要的觀點與推論起點是「沒有公婆的一代」，加上引號之後，「沒有公婆的一代」成為一個特殊概念，意指一種在特定歷史脈絡和社會結構之下出現的世代（逃難與生存）、狀態（離家與成家）和概念（女性與地位提升），延伸出本書的三個主要章節，呼應了歷史、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知識關懷。

長期以來，男女面對戰爭的方式和貢獻被刻板印象化，也被賦予不同的價值判斷，本書透過深入訪談和口述歷史，嘗試改寫既定論述，翻轉前方與後方的二分法，讓我們得以從女性觀點認識戰爭的衝擊，看見女性的特殊經驗（例如女性月事的處理）以及兩性在戰爭之中的分工與貢獻。

為何沒有公婆？因為在戰亂危急之下，多數來台軍民是奉命或是在無法選擇之下倉促抵台，多數人沒有機會或條件可以將家人或是公婆帶到台灣。在這種情形之下，理論上應該只有自己可以來台，但事實並不是如此，因而出現許多值得探討的面向。

例如，混亂之際，為何有人（不）可以將家屬帶到台灣呢？我們該如何理解此波移民來台機會的特殊性和選擇性？平實而言，具有交通優勢的軍種（海軍空軍）或是政軍高層比較有機會可以攜帶家眷。就此而言，雖然來台外省女性普遍沒有公婆相伴，但大多有家人相隨，可能是父母、配偶、兄弟姊妹或是子女等，相較之下，多數外省來台（平民）男性沒有類似條件，本文稍後將就此討論來台軍民生存條件與生命經驗的兩性差異。

於是，在公婆缺席之下，來台女性不用忌憚公婆的威嚴，可以「對先生大小聲」、有話直說就事論事，我們得以看清，男尊女卑之所以可能並不是因為男性秀異，而是父權制提供了各種雄性優勢的制度基礎，一旦戰爭鬆動此一體制，女性得以脫離家族和公婆的控制，進而活出自信和獨立，夫妻之間的家庭方程式也得以改寫，諸如家事分工、資源分配、祭祀儀式、子女命名等，都因此出現新的認知與解方。戰爭讓一切從簡，也讓女性得到了禁錮已久的自主性。

如作者所言，雖然沒有太多人會肯定戰爭的好處，但對於人文歷史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而言，戰爭衝擊則是提供了許多重要的研究對象與珍貴資料，作者使用「社會實驗室」一詞來統一指稱戰爭研究者面對的各種議題與情境，這是本書提出的第二個深具啟發性的概念，特別是在方法上可以引發各種深化討論。

相對於自然實驗室之中可以透過人為操作的實驗組和對照組，社會實驗室並沒有這麼多研究者可以迂迴掌握的研究設計和操作空間，情況甚至更糟。例如，我們如何可能找到當初沒有逃難離家的對照組？以八、九十歲來台女性為主的受訪者是否需要擔心倖存者效應或是同質選樣的問題？這些方法上的質疑都必須面對，也不易解決。

相對地，如果缺乏可以依循操作研究邏輯的空間，我們是否就該因噎廢食地放棄戰爭研究，還是可以在面對所剩不多的受訪者和時間壓力下透過各種方式（旁證、文獻、三角測量等）嘗試修正或補救？面對戰爭如此一個亟需了解而無法迴避的重大議題，我們就可以了解為何作者會在書中多次反思相關方法上的困境與出路。

三、幾個可以深入探討的面向

（一）平民經驗的兩性差異

《「沒有公婆的一代」》一書嘗試從女性和平民的角度反思戰爭，但平民觀點並不完全是女性，還有男性，我們該如何看待平民戰爭經驗的兩性差異呢？本書提及一個明顯差異是兩性面對「思親、懷鄉」的不同反應，相較於男性經常淚如雨下，女性則是相對平淡許多，為什麼？或許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來探討。

其一，這是男女性別社會化的結果。在父權傳統之下，男女各有不同的社會化內涵，延續香火、思親盡孝被認為是男性應該重視的主要價值，若未能有所實踐，自然悔恨交加，女性則是比較沒有這樣的角色期待，因為她們已經「出嫁」或是「嫁入」夫家。這也就不奇怪，作者也提及，相對於男性對於親人、家鄉和祖國的懷念和重視，女性則是比較關注生活瑣事。

於是，我們不難理解，在不考慮命名者教育程度之下，「興華、復國、耀宗、念祖、思豫（河南）、台生」幾乎都是男性專屬的名字，藉此支撐男性對於家國事務的重視和家族移動的記錄，相對地，女性命名多半不太涉及家族事務，從名字決定的那一刻起，女人已經被排除在家國和宗族之外，自然不會對此表現強烈的情緒反應。

其二，上述差異主要反映來台男女樣本生命經驗的不同。如作者多次在書中提及，來台女性或是受訪者們多半有家屬（可能是父母、兄弟姊妹、配偶或子女）陪同，雖然物質條件艱辛，但來台之初若有家人相伴，比較容易找到社會支持和情緒出口，不易累積抑鬱，思親懷鄉之憂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紓解。相較之下，除了少數高階政軍官員、中央民意代表可以攜眷抵台，多數來台男性則是隨軍隊或政府部門單身抵台，加上禁婚令的限制，許多人無法順利成婚或是必須晚婚，長年累積的情感能量自然較為強烈。

其三，此一差異也有可能是源於測量方式或時機的不同。多數男性（尤其是軍警公教）平常情感較為內斂，不易輕易顯露情緒，一旦在媒體關注之下或是有機會被問及兩岸隔離、親情阻斷等問題時，就

如同找到一個適當舞台，讓壓抑已久的情感找到宣洩出口。[1]

（二）「沒有公婆的一代」的本省版

就省籍比較而言，來台外省女性形成了所謂的外省內婚家庭，因而可以與外省通婚家庭形成兩個分析上的對照組別。雖然外省內婚家庭和外省通婚家庭有許多重要差異（例如年齡差距、婚配對象的教育程度和族群身分），但有趣的是，這兩個家庭組別或是妻子們都一樣在社會實驗室之中面臨「沒有公婆」的情境，非常值得進行實證比較，探討她們是否可以或是如何取得家庭自主和社會流動。

例如，沒有公婆的本省妻子如何成家？她們又會得到何種不一樣的生活與流動經驗？以我母親（台南市人）為例，她是家中長女，下面有四個妹妹，和父親（山東人）結婚之後生下我，滿月之後經常告知四個阿姨：「今晚我要去跳舞，你們誰來幫我帶小孩？」如此沒有公婆的婚後生活，令幾個阿姨羨慕不已，其中三位後來陸續嫁給外省人（都是山東人）。

（三）省籍差異的再理解

討論省籍差異時，作者表示「在家父長權威盛行的華人社會，重男輕女、男尊女卑的意識形態未必有省籍差異」（p. 217），本文就此提出進一步討論。一方面，「未必有省籍差異」可能是對的，作者指出（pp. 184-185），不論是山東長大的黃女士（TP03）或是江蘇長大的岳女士（TP11），她們的成長經驗都見證了華人社會家父長制下的重男輕女，戰前或戰後的台灣華人社會也是如此，就此而言，「未必有省籍差異」的確說得通。

但我們該如何看待那一位會替家人和女兒「洗衣服和刷鞋子」的

1　一位學生曾經提及，他的外省爺爺平常沉默寡言但夜晚經常做惡夢大叫，驚醒家人。數年後，該名學生為了完成一份家族生命史的報告，在爸爸的協助之下，多次央求爺爺說出做惡夢的原因和內容，爺爺思索再三勉強說出夢中頻繁出現的離家過程與殘酷戰爭畫面，最後祖孫三人抱頭痛哭。

爸爸呢（p. 192）？根據書中資料，蘭女士（KH15 / 受訪時 77 歲）幼年在台灣長大，她的父親不允許女兒為了工作出去拋頭露面，卻會替女兒「洗衣服和刷鞋子」，筆者認為此一行為之所以會出現，必須放在抵台之後的歷史背景和社會脈絡之下才可以理解。因為公婆缺席、也毋需擔心眾多家族成員的注視目光和指指點點，這位爸爸才會願意為女兒洗衣服和刷鞋子。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父親幫女兒洗衣服和刷鞋子的畫面，並不是出現在大陸老家，而是出現在抵台之後沒有公婆的外省家庭之中，如此沒有公婆才有了特殊的歷史與社會學分析意義。這是因為，若是回到公婆在場的大陸老家，這位父親就不是「外省人」，要等到他因為戰爭來到台灣，「外省特徵」才得以形成：在沒有公婆的家族結構之下，才會出現這位下班後會幫女兒洗衣服和刷皮鞋的父親。就此而言，「男尊女卑的意識形態未必有省籍差異」的說法就不一定說得通。

這讓我們得以思考一個有趣的問題：所謂的「外省特徵」到底是一種大陸華人社會生活方式的延續（例如黃女士和岳女士幼年時期經歷的家父長權威），還是來到台灣之後因應各種變化才出現的特殊生活經驗？如果沒有釐清此一差異，就很容易將這一群人抵台前後的不同生活經驗混為一談。筆者個人認為，來台外省人的各種社會文化特性（以及省籍差異）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特殊歷史情境和社會結構下的產物，這些特徵或是差異不一定可以向上追溯，也不一定可以向下推論或是被複製至下一代（李廣均 2025）。

（四）資料與方法

作者不止一次提及，本書受訪者的選樣和口述歷史的資料效度容易引起方法上的質疑。就選樣而言，研究來台軍民面臨一個兩難，由於當事人年事已高，來台女性又屬於少數，尋找受訪者非常不容易，又必須趕快把握所剩不多的時間，這是研究選樣上極大的挑戰。

其次，如何看待戰爭與逃難往往決定於結果，如果後來平步青雲

就會覺得當時的決定是對的，或表示這是「這輩子過得最好的日子」（p.127），反之則會悔不當初。我的田野經驗也顯示，有人靠著隨營補習取得了高中學歷檢定，升上軍官也拿到了終身俸，卻也有人當初選擇提前離營，放棄了終身俸，希望可以出去闖出一片天，但事與願違因而晚年抑鬱寡歡，他們看待過往種種的心態和評斷大不相同。

對此我們很難在實證基礎之上得到確認，因為我們不可能回到最初去訪問選擇留下來的人，只能以那些逃難離家並在戰爭之中存活下來至 80、90 歲的受訪者作為主要資料來源，卻也容易出現倖存者效應，作者當然意識到這個可能存在的方法困境，因而必須透過各種理論、文獻與旁證來支持論述。研究對象的稀少性和重要性並不能讓我們免除方法上的質疑，我們仍然必須謹慎以對，這也凸顯出戰爭研究者的一大挑戰。

其三，關於本書的受訪者，這些樣本是否可以進一步呈現值得分析的差異面向？例如，可以在衣服裡面縫進一些黃金的算是平民嗎（p.100）？雖然來台原因各有不同（我是來台灣玩，不是來逃難的），又會各自發展出哪些不一樣的生存策略？戰爭帶來了無法挽回的破壞和傷害，鬆動了社會秩序和道德規訓，但這是否對每一個人都有一樣的意義？哪些人比較可能逃家進而追求婚姻和人生的自主性，又有哪些人無法掌握這些選項？

四、小結

面對戰爭，人如何生存？每一個人所處的社會位置、資源掌握都不一樣，回應戰爭的方式與結果也不一樣，這些問題的思考與回答成為學界可以探討的主題，我們或許可以稱此為戰爭史學或是戰爭社會學的想像，《「沒有公婆的一代」》即是從女性和平民視角來探討 1940/50 年代外省女性的逃難與成家。

如果你對於戰爭、性別議題、戰後台灣史、方法論有興趣的話，我強力推薦此書。除此之外，本書導論對於戰後社會史提出一個詳細完整的文獻回顧也是一大亮點，作者也針對傳統以男性為主的代間或

代內職業轉換研究提出批評，指出如何可以聚焦女性婚前與婚後的改變，藉以突破傳統社會流動的性別盲點。

戰爭帶來傷害也帶來釋放，戰爭拆解了人類社會各種隱而不顯的體制，也讓各種受壓抑的主體得以有機會取得自主性，對此本書以女性經驗提供了一個最好的起點與視角。預期未來戰爭中的女性經驗將會得到愈來愈多的關注和討論，尤其是在飽受戰爭風險困擾的台灣。女性觀點的發聲可以針對一向是由男性主導發動戰爭的人類歷史提出批判和反思，這將會是本書帶來的重要影響之一。

參考文獻

李廣均，2025，〈戰爭移民：1949 來台軍民自稱與他稱的初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30: 1-38。